

试论史书特点与编辑对策

罗 通 秀

历史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史籍,现实和未来呼唤更多更好的历史类图书。人们之所以偏爱史书,一则因为人是历史的人,文化的人,史书所载的历史与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二则因为史书有着其他种类的图书不曾有或少有的特点,如史书具有教育人、熏染人、塑造人、维系与弘扬民族文化等社会功能,具有史论结合、描述与解释兼备的风格,具有知识量大、综合性强、在批判继承中创新等显著特征。重视史书的编辑出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充分认识史书的功能及特点,总结和借鉴前人在史书编辑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强理论修养,提高业务素质,认真做好史书的编辑工作,弘扬民族的优秀历史和文化,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认识史书的基本特点

认识史书的基本特点,有助于为史书编辑工作确立一个大致的“参照系”,也有助于史书编辑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及努力的方向。但史书历史久数量多、体例繁,且各具特色,因而本文抽象出的史书的特点,只能是对大部分史书而言,同时也是相对于史书之外的别的图书而言的。

特点之一,是社会功能巨大。

首先,史书具有维系和促进民族历史与文化持续与稳定的功能。历史之于国家和民族,正如记忆之于个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记忆,就会变成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会灭种灭族。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古老民族曾创造过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人、苏美尔人、达罗毗荼人、马雅人、中国人,等等。这些古老文明,后来大都消亡了,并且不曾复兴过,唯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却始终维持其文明性格的连续性。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史以来就比较重视且从未间断史书的编撰,保存了大量的连续的历史文化典籍,从而维系了民族历史的持续发展,保存了复兴民族文化的火种,而许多别的古老民族,在天灾人祸(战争)重击之下亡国的同时,历史文化典籍也被摧毁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人数典忘祖,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创造发明、风俗习惯、英雄人物,等等,茫然无知。当他们不知祖国为何物时,自然谈不上爱国,甚至还会啾颜事仇,不以为耻。这样的民族,就没有了复兴的希望。

正因为史书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亡息息相关,所以各国各民族都比较重视修史,

并鼓励国民学习历史。一些有识之士深沉地告诫世人：“欲知大道，必先知史。”^①“国可灭，而史不可灭。”^②同样，征服者为维持其对被征服者的统治，也往往毁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文化典籍，篡改、歪曲被征服民族的历史。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李斯建议焚书以统一思想。在李斯建议要焚的书中，史书被列在首位。李斯建议的第一条便是：“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即除留下秦国历史记载外，将已灭六国的史书付之一炬。又如本世纪30年代，当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时，日本历史学家秋泽修二匆忙抛出《支那社会构成》一书，胡说中国历史的性格有着一种固有的“循环”、“复归”的“亚细亚”的“停滞性”，中国历史的每一前进，都是由“外力”所推动的，因而“皇军的武力”将是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契机。一个要焚六国之史书，一个肆意歪曲中国的历史。前者为了大一统，并釜底抽薪，熄灭六国复活的火种；后者为了征服中国，编造了一套“侵华有理”的谬论。两者的性质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手法与目的却有相似之处，即“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必先去其史”^③。

其次，史书具有教育人、熏染人、塑造人的功能。

史书通常通过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历史过程的记载，展示那些事件、人物和过程中包含的内在哲理，使人们通过具体的历史情节去领悟其中蕴含的哲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种历史意识或世界观。例如，科学的历史著作，能帮助读者了解人类社会的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帮助读者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读者追随世界潮流顺应历史发展；也有助于培养读者的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热爱民主与科学、热爱祖国、鄙视剥削和剥削阶级、鄙视专制与愚昧、鄙视投降卖国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培养思想行为更健全的新人。

好的史书还具有扩大读者知识面、增强读者应付现实生活挑战的本领的功能。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史书中汲取历史经验，察古知今，顾往思来，增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古今中外许多人从自身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读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观点”，“历史是生活的教师”，“研究历史是政治智慧的开端”，“以史为鉴，可知治国”。

正因为史书有巨大的社会功能，所以各时代各阶级的人们都偏爱它。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撰“正史”，封建帝王们还视之为“教科书”。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私利，也总是战战兢兢地请出历史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④他们的史书虽以“客观”、“公正”相标榜，实际上是为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的目的，总是随心所欲地歪曲别国的历史。同任何别的阶级相比，无产阶级更偏爱和重视历史科学。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⑤毛泽东同志认为，革命的政党必须具备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必须了解现实，必须继承珍贵的历史遗产^⑥。各阶级对史书的重视，既证明了史书功能巨大，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史书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特点之二，描述与解释兼备，史实与理论结合。这是史书不同于自然科学类图书，也不同于哲学及别的社会科学类图书的主要标志。

史书是记录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规律的书。何谓历史？“史者事也。”已往所发生的一切事，不管是大、小、轻、重，也无论是社会的、自然的、有形的、隐形的，都在广义的历史内容之内。“学者与事，有描写与解释之责任。最注重于描写的学术，就是科学，最注重于解释的学术，就是哲学。”^⑦史学则“兼带有科学与哲学二者的性质”^⑧，它既要描写事物的过程与真相，又要解释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然而，它又不同于科学与哲学两种功

能的简单相加。史学注重事与时间的关系，受时间的节制，而科学与哲学都是超时间的。一般说来，“哲学只求合理，便谓其事已解；科学注重试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每试必验，便谓其说已成。”^⑨而史学却不能专靠逻辑推理，它的每一个结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它也不能凭试验以真见假，因为史事不能完全重演。由此可见，史学比单纯的科学和哲学都难，而一部科学的历史著作，其难度与价值也决不是一项科学发明或哲学论著之下。

史学也不同于文学，它有别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尽管史书也要有文采，要有艺术性，讲究辞藻的使用和语句的通畅。没有这些，史书就失去了吸引读者的魅力，其影响必然有限，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⑩。但史书又不能象文学作品那样以语言为手段来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它不允许用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去塑造人物和事件。它只能依据大量的、经过严格审查的、确凿无疑的史料，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并以科学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和事件的因果。

总之，严肃的历史研究与科学的历史著作，应该“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⑪，应该具有史论结合、实事求是的鲜明特征。

在继承中创新也是史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史书编撰的历史十分悠久。在中国，史书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在中国图书史上的地位不断上升^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历代有作为的史家在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在内容与形式上，既继承前人的优秀史学遗产，又勇于探索，刻意创新。

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最初的史书尚无一定的史例、史法，它们或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与神话结合在一起的氏族部落事迹的记录，或是英雄的传说，谈不上严格的时间观念和求真的精神。随后出现的编年史书，尽管内容仍十分简单零散，有的甚至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但书中的许多内容已比较接近历史真实，且有了初步的著述原则。中国的“史界太祖”^⑬司马迁就是在借鉴和利用这些史书的同时，写出了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⑭的历史巨著《史记》的。《史记》发明的治史原则和方法，曾启迪和滋养了无数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史书，也被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视为修史的典范；其在描述和解释历史方面的成就，也得到后世史家的首肯和借鉴。如班固就继承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常璩则借鉴《史记》等“正史”的体例，编纂了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方志《华阳国志》；杜佑则撰写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司马光则利用“正史”和杂史的成果，完成了一部贯穿1362年治乱兴衰的史实、多达294卷的巨著《资治通鉴》；袁枢则在继承司马光的成果的基础上，又创一史书新体例一纪事本末体，并用这种体例写了一部史学要籍《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受《资治通鉴》通贯古今这一特点的启发，以《通典》为蓝本，编撰了一部贯穿历代典章制度的大史书《文献通考》；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生极力提倡读史，也偏重历史研究，他写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学术思想史，此书开创了“学案”体例，影响深远，他的这一成就也是在继承前人类似学术史的传记或著作的基础上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给我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一批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的力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书的问世，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些新的史书，或以新的考古材料或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取胜，或在观点、结论上成一家之言，或在体例、文采上刻意求新，甚或三者兼而有之，令人耳目一新。科学的历史哲学及新的史

料的发现对史学的革新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成就也是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史学遗产的结果，历史虚无主义决不能带来史学及史书的新面貌。

知识量大、综合性强，也是史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特点。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作为描述和解释历史的图书，其内容也必然异常丰富，其表达方式也必然多彩多姿。中国历代的史书编撰者，为了比较准确生动地描述历史和合理地解释历史，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众多的史书题材，诸如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历史评论体、章节体等等。尽管这些体裁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取得的成就有大小之分，所记历史内容的侧重点不一，形式与结构也迥然有别，但它们都有相似之处，即所涉知识面相当广博，信息容纳量比较大，综合性强。无论是一部采用章节体编撰的中国通史，还是采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某一朝代的“正史”，抑或那些用别种体裁撰写的纪、传、书、志，以及《通典》、《通考》、《会要》等等，无不把历代或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司法、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地理、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生物、物理、化学、机械、土木、工程、矿冶、建筑、纺织……等等方面的史实和知识成果囊括其中，汇于一苑。可以说，这些史书实际上是一座包容了中华民族世代积累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大百科全书宝库。以笔者案头两部史书为例，可以看出史书所涉知识面之广。一本是《中华人民通史》（张舜徽著），全书分“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大部分，每一编又分若干专题，如“学艺编”下分文字、书籍、文学、史学、方志学、文献学、哲学、宗教、音乐、书画等，从学术的角度，较全面介绍了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另一本是一部县志，它记载的仅是一县范围内的历史，其内容就涉及建制、自然地理、人口、农业、林业、水电、工业、交通、邮电、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税务、金融、城乡建设、人民物质生活、政党、政权、人民政协、群众团体、司法、劳动人事、民政、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药卫生、风俗、方言、人物及大事记等。其中每一大类都含十几个小类，小类中又含若干细目，如“文化”类中有一“民间文艺形式”，其中就包括地方戏曲、地方曲艺、民歌民乐、舞蹈、游戏、雕塑、剪纸、杂技、故事传说、谣谚谜语及书法绘画摄影等，举凡人类知识，几乎包罗殆尽。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及各门独立学科的出现，许多学科都出现了以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支学科，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史、政治学中的政治制度史、地球学中的地史学，等等。史学日益延伸到其他学科，具有交叉学科内容的史书纷纷问世，史书内容日益体现出综合性与跨学科性相结合的特点。

二、史书编辑的理论与知识准备

从事史学书稿的编辑与从事其他学科书稿的编辑，在编辑工作程序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其日常工作不外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选题，然后按确定的选题计划物色作者、组织书稿，继之对书稿进行审读、加工、整理、定稿，书出版后，作必要的宣传评介和收集社会反映等工作，但由于史书具有前面列举的一些特点，故史书编辑在理论修养、专业知识修养及在编辑工作的具体操作等方面，与别的学科图书编辑不完全相同。

在理论修养方面，必须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及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规定了我们必须这样做，更主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集人类迄今为止的先进思想成果之大成，其揭示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然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做好史书的编辑工作。

如前所述，史书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和鲜明的阶级性，科学的历史著作在积累和传播人类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方面、在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方面、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反科学的历史著作，则势必引起人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怀疑和否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产生消极的作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史学阵地的斗争长期存在。从事史书编辑的人，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当前，尤其要在下列一系列重大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抵制唯心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即在人们纷繁错杂、意愿各别、交互作用乃至互相冲突的无数历史活动中，“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⑤警惕用各种变相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需要”或“利益”或“欲望”“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多种因素随机组合”论等观点，曲解历史发展的动力。

——坚持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观点，即人民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⑥。决不能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或“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之类的概念去代替社会形态概念。

——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取消或歪曲阶级分析的反科学的观点和倾向，例如要反对按收入的多少、职业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等来划分阶级的倾向；还要抵制美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的倾向，以个性和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的倾向，以及用抽象的文化或国民“劣根性”等概念代替阶级分析的倾向。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决不能用所谓“人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的说法或变相的“新英雄史观”来取代。

——坚持以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和某种狭隘的政治需要去褒贬历史人物，尤其要防止肆意诋毁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吹捧剥削阶级及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倾向。

——坚持辩证地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反对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批判所谓“黄色文明”天生具有“内向型”、“封闭型”的“文化性格”是走向“自杀”的文明的谬论。

史书只有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辨别是非，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实现其社会价值，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专业知识修养方面，史书编辑应尽最大努力拓宽知识面，成为博学多才的人。他除了熟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懂得各门学科的常识以及在语法、修辞、逻辑、外语、工具书等方面有扎实基本功和良好训练外，还必须成为两门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方面的通才。无所不包的历史及知识信息量大、综合性强的史书，要求史书编辑拥有广博的知识，否则，就做不到选题对路、审稿识“货”、加工得法，就很可能在选题时视毒草为香花、视平庸为高雅、视猎奇为创新；或凭主观臆断，妄加殊笔。

为了胜任史书编辑工作，从事史书编辑的人首先要在两门通史上有相当渊博的知识。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尚钺等编著的几部关于中国通史以及古代史学要

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应作为必读书。《二十五史》至少应能翻阅,大致了解并能运用,《十通》及其他文史工具书也应娴熟于胸,善于检阅。在世界史方面,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要读,藉以获得“索引”式的知识,还要精读若干种世界史学名著以及有影响的断代史、国别史。要熟悉史学史及当代史学思潮。此外,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也是史书编辑所应必备的。其次,在史学专业技能方面要有一定的素养。这些技能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等等。

在确定选题和审读书稿时,编辑必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该选题前人是否有研究成果或同类书?新的选题及书稿有哪些不同?要想获取满意的答案,只有借助编辑的知识储备和图书目录的帮助。特别是后者,可以较准确地展示与手头选题及书稿相关的材料及前人的成果,有助于我们进行比较鉴别,作出判断,从而为选题及书稿的取舍或修改提供充分的根据。显然,目录学对编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认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①现代史学大师陈垣也曾指出:“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②读书治学是这样,编辑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史书编辑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七十六年史学书目》及史学年鉴等,应作为必读之书。此外,应留心新近出版的有关史学书目的图书,获取必要的学科发展状况及史书出版方面的情报和信息。

目录书可以揭示前人的成就。但前人的书,特别是古人的书,在长期流传中会出现多种版本。版本有善劣、真伪之分,价值有高低之别。只有择善而从,利用善本书的材料方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就会闹出荒谬的笑话。编辑掌握一些版本方面的知识,对审稿是大有益处的。

史书通常都大量征引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也有正误、真伪之分,古代文献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曾分段分句,作者在引用时难免出现误断误释的事。这就要求史书编辑具备良好的古汉语素养,懂得校勘与考证的技能,通过正确分断分句,通过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以及本证、旁证、理证等途径,达到正事实、通文字、去谬误的目的。只有在准确、翔实、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对历史真相及规律的正确认识,才能使史书的学术价值及社会效益得到基本的保证。

三、史书的选题与审稿

在图书出版的全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选题与审稿。选题是出版社为一个特定时间内计划编辑出版的图书所选定的题目。一家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反映了该社的性质、方向、目标及特色,关系到出版社的兴衰成败。编辑在确定选题时担任主要角色,负有首要责任,应该注重调查研究、充分搜集情报,对相关学科的学术动态,有关出版社的出版动态等有尽可能详尽的了解,切忌侥幸取胜、闭门造车、急功近利,或者热衷热门、步入后尘、盲目从事。

史书的选题,尤要慎重,因为史书有着上面论及的多方面功能,选题成功与否,事关重大。笔者以为,史书选题当否,应用科学性、创造性、系统性、现实性的标准进行衡量。史书的科学性,就是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著书立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描述历史真相和解释历史现象,探讨历史规律,而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歪曲篡改历史,或以唯心史观解释历史。史书的创造性,是指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或对前人尚未彻底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一个新的史书选题,要么以开拓新领域、填补学术空白而见长,要么以

新材料为依据提出新观点而取胜，要么以新理论、新角度看问题给人以启迪，要么以新体裁、新结构、新文风而引人入胜，方可考虑选用。如果从内容到形式、从材料到观点，全无新意，炒现成饭，那就根本没有出版价值，就难以保证史书的质量。强调选题要新，当然是指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而非那种追逐西方五花八门的唯心主义新思潮、搬弄新名词、新术语、食“洋”不化的所谓“创新”。史书的系统性，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继续前人的史学成果，在此基础上作纵向横向的扩展，如《史记》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二十五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之后的续编。二是选择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一专题为对象的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作为一批书或一套书的选题，以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记载和保存，如《中国文化丛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丛书》，等等。史书的现实性，是指从当代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人面临的种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出发而提出的选题，这种选题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及表现形式，可以成为当代人解决现实问题的借鉴，如人口史、对外开放史、民族史、风情或风俗史、家庭史、考试制度史、救荒史……等等。

好的选题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作者来完成。史书的作者，尤其需要长时期的知识积累与技能训练，通常是些“大器晚成”的人。编辑应从那些长期坐冷板凳、面壁苦读、耐得寂寞、勤奋治学的史学工作者中物色史书作者。

决定书稿质量的另一关键环节是审稿。这是对原稿内容的政治性、学术性及体例结构、逻辑文字等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确定采用与否或提出修改意见。笔者以为，史书书稿的审读，首要的是在史论结合上把好关。史指史实史料，论指理论和结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史料作根据，谁也写不出有价值的史书。史书编辑必须真正做到对史料的来源、性质、用途及其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有所了解，以便对书稿的优劣作出准确判断。对史书中“论”的审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二是看作者所得出的理论是否与史料吻合，即是否建立在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综合、概括的基础上。除了在史论结合上把关外，还要避免政治性、政策性的错误，对书稿的体例、结构、逻辑、文字等方面也要综合思考、比较得失，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提出恰当的处理方案，写好审读意见。审稿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需要平等、民主、谦虚、谨慎、认真、细致、严谨的气度和作风，切忌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孤陋寡闻、浮光掠影、以偏概全、马虎草率等不良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当好稿件的法官，做一名称职的编辑。

注 释：

①③ 参见龚自珍的《古史钩沉》、《尊史》等文。

② 参见连横的《台湾通史》一书自序。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650页。

⑥⑪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533、801页。

⑦⑧⑨ 参见《洪业论学集》，第193~196页。

⑩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⑫ 在《七略》和班固的《汉书》中，史是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的。西晋时，荀勗在《中经新簿》中，将典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丙部专记史书。东晋李充在《晋元帝四部》书目中，始用乙部专记史书。明清之际的李贽、章学诚先后提出“六经皆史”。

⑬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⑭ 鲁迅：《汉文学史纲》。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⑯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⑰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

⑱ 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